

读到刘立云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诗集《烤蓝》，已是一年前的事了，那时就因有幸欣赏到这部有很高质量的诗集，对他抱有某种由衷的赞许与钦佩。在不少军旅诗人，甚至是杰出的军旅生活的歌者歇笔罢耕、改弦更辙之时，立云则始终坚持军旅题材诗歌的探索 and 写作，执著地“以诗歌这种贵重的声音歌唱到今天”，显示出一种颇为可贵的挚爱与坚韧。这部诗歌力作不仅标志着立云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的收获，摘得了令人羡慕的诗的桂冠，并且也以自己的艺术追求，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普遍关注、产生很大影响的军旅诗歌文学继续向前拓展，为军旅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立云的军人身份和角色意识，使他自觉、主动甚至是痴情地把一双审视的目光，始终投向军队这个巨大的绿色方阵，注视和思考和平阳光下的当代军人及其情感、命运和意义。以“烤蓝”为题并且贯穿在诗集中的“烤蓝”这个意象，无疑是立云的一个重要发现，同时也是他寻找到的一个抒情支点。立云的诗作使我们感到，“烤蓝”既是一种借代，即表明这种用烈火给金属烤蓝的特殊工艺，赋予兵器以特殊的质感和色泽；同时又是一象象征，即无论战争岁月或和平年代，军人的体魄和意志实际上都必须经受烈火般炙烤，而锻造出钢铁般的质地，这无疑是诗人对军人现代生存方式和状态的一种深刻理解。如“我就是煨在炉火中的/那块铁/我红光烁烁/却如瘫如泥”，“这块铁从高温的悬崖/跌落下来/迎接它的/零度以下的寒冷”，“在循环往复中脱胎换骨/渐

叙事的指向

——评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 □王凤英

常常慨叹于报告文学暗转于新闻的记录从而不动声色淡化文学的姿色，那些分明并不弱于雷击式的灵锐关注渐次成为点缀，使许多构成篇章和生动表达的语言叙述被新闻传递的范式取代。具有新闻特点的报告文学模糊了自身的成色质地，为数不少的简单直观和功利表现社会生活对象会铺天盖地于作者的笔端，似乎已见惯不怪。然而，这种似乎近于普及式的写作追求由于人的主观经验受制于颂扬法则的客观性，报告文学成了集体组织与机械的奴仆，使生命降至苍白的物质化与机械化的热情中，因而导致文学书写精神的情绪不断煎熬。姑不论直观快速的传媒速递具有多少深刻性、形象性，个体的体验思考便在匆忙的环顾和浮光掠影式描述之后仅存陌山陌水般的共同声明，而文学功能因未能充分发挥而遗失殆尽。

李鸣生这部《震中在人心》不啻以一种还原式写作直抵内在感知的个性彼岸，将报告文学的表现理解为用心地镌刻出不凡的深度和品质。

诚然，没有人喜欢苦难，但苦难依然不期而至。人类总是无法规避任何苦难，这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的悲哀远不止于此，即便历经了无数劫难，劫难仍无休止。苦难的力量通常可以慑服人的精神。李鸣生在作品中两眼泣血地使文学呈现出地震灾难的真实场景，图文互解，以细腻和颇具震撼力的镜头感异乎寻常地径直插入让生命不可抗拒地抽搐的疼痛本能感受，地震本真的现场感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和苦难的颜色深入人心。例如，第一幕“山崩地裂那一刻”，说地震后一条公路全拱起来了，像一块块跷跷板，路面扯开又合拢，合拢了又扯开，逼真再现地震时的恐

弘扬民族精神

——评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 □梁鸿鹰

彭荆风所著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以决战大西南这场在我国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大战役为核心内容,通过纪实化、艺术化的描写,反映这场怪了国民党在中国内地统治的大决战彻底胜利的历史必然,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一切困难,争取一切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一部弘扬民族精神的内涵丰富的作品。

《解放大西南》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视野开阔,作家统揽全局,善于从全局入手进行艺术表现。作品的大背景是民族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政府退至最后一个据点重庆,企图负隅顽抗。作家站在全国解放战争全局的高度,对解放大西南的进程进行了收放自如的全景式描写。作品艺术地告诉人们,1949年9月,毛泽东、朱德约请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研究部署、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断其后路,再打之”的解放大西南战略实施方针,随之这一战略部署得到了全面实施。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共西南局坚决贯彻中央决策,明确要求进驻昆明、陈赓、宋任穷等将军,在北平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要强去办。卢汉是起义将领,尊重和信任卢汉,对于稳定云南局面有着积极的意义。卢汉之所以能够在我党影响下周旋在敌方之间,发挥其独到作用,就在于我们党政策的感召力和向心力强大,

真诚的守望者

——评诗集《烤蓝》 □汪守德

渐长出咬碎另一块铁的牙齿”(《烤蓝》),其中的寓意是十分明了的。而“枪口里埋藏着风暴”和“你就静静地/在每一只眼睛里/坐成一棵消息树”(《零点归来》),勾画出的都是军人引而不发,却又日夜砥砺自身,随时准备愤然一击的姿态。正因为这样一种意识所驱使,军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才会着迷地去体验枪,“脸上浮现出对枪的迷恋、偏爱和敬畏”(《热爱这支枪》);在闲暇时去数子弹,“我们教数它们/就像教清我的手指”(《闲暇时数数子弹》)。这样的诗作显然既包含强烈的警醒意味,也表明某种钢铁的物质已融化在军人抑或诗人的血液之中。

作为一名出色的军旅诗人,刘立云的目光总是更多关注现实的军旅生活,虽然这是一个被诗人反复耕耘过的熟地,但感觉敏锐的立云以新的视角,从中发现和捕捉到了许多新的意趣。如军营严格而琐碎的时间节点和单调而充实的生活内容,实现着对军人的塑造和雕琢,诗人的叙述充满了强烈的意味和美感(《一个士兵的二十四小时》)。有支部队因编制体制调整从序列中消失了,诗人不厌其烦、甚至如数家珍地描写属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军营生活的许

多细节,这既表达出诗人对于军营和战友的特殊情感,也反映出对于军队需要“重铸”的清醒认识(《一座兵营空了》)。诗人在颇具情致的《有关水的传说》中写到,抗道饥渴的非常记忆使军人丈夫深夜惊梦,善解人意的妻子则别出心裁,“从此后寂静的厨房里/夜夜传来滴水的声音”,这一细节是那樣的温馨和动人。没有对军旅生活超常而持续的专注,写不出如此具有缤纷军旅色彩,如此富有情感和生活意蕴的诗篇。

刘立云又常常是位激情澎湃的歌者,他的诗作常常聚焦于重大军事行动,如战争、抗洪、抗震、抗冰雪,但他对之并非远距离的眺望,而是每有可能便投身其中冲在前面,在战斗一线活跃着自己的身影,去亲身感受那些伟大的斗争,激发创作的热情并写下深沉激昂的诗作。这充分体现出作为军旅诗人的强烈责任感,以及作为一名军人所具有的内在胆魄和满腔热血。如在《雪像雪那样坚硬》中,诗人怀着强烈的关切之情,走进冰冻雪凝的南国,看到党、国家、军队和人民万众一心的抗击灾害,那种具有融冰化雪的热度,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写道:“当雪像雪那样坚硬/人也像人那样伟大”。而《挖掘啊,

一部生命之书

——评散文集《藏地兵书》 □殷 实

地震毕竟是在隆隆声中开始，是在一片废墟中结束，而灵魂的惊悸在破碎中站立显得很不容易。李鸣生的作品中用“我”的个性化视角串联起各个相关内容和章节，有“我”的地方弥漫着更为深切的痛楚。在他梓里发生的天崩地裂，急遽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承受催生了作品另一种更真实的精神呈现秩序，在技巧上肯定裹挟起更多的还原式虔诚，语言上依然斡旋于逻辑与理性的约束，并能服膺于心灵的自动表现。那些无法忽略的伤痛在“我”的滔滔不绝的无语流淌下平静铺陈，去发现那些前所未知而一直游走的细部，拖曳出更为深沉的表现，正如海明威所说，冰山八分之七的体积是隐藏水底的。

地震毕竟是在隆隆声中开始，是在一片废墟中结束，而灵魂的惊悸在破碎中站立显得很不容易。李鸣生的作品中用“我”的个性化视角串联起各个相关内容和章节，有“我”的地方弥漫着更为深切的痛楚。在他梓里发生的天崩地裂，急遽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承受催生了作品另一种更真实的精神呈现秩序，在技巧上肯定裹挟起更多的还原式虔诚，语言上依然斡旋于逻辑与理性的约束，并能服膺于心灵的自动表现。那些无法忽略的伤痛在“我”的滔滔不绝的无语流淌下平静铺陈，去发现那些前所未知而一直游走的细部，拖曳出更为深沉的表现，正如海明威所说，冰山八分之七的体积是隐藏水底的。

《震中在人心》，李鸣生用心灵行吟心声，很好地运用文学涂进了图片的震撼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看是撞击人们情感强劲的后座力，展示了报告文学和谐的传递范式。但作品最成功之处，在于作者用灵魂镌刻的心灵之裂痕宛如冲击波，排山倒海。

一部生命之书

——评散文集《藏地兵书》 □殷 实

《藏地兵书》是王宗仁对自己心中藏地的珍藏，是他融入了太多自己生命印记和体验的藏地之书。之所以要冠以“兵书”二字，大约是因为他的全部眷恋和情思，皆缘于他作为一个“兵”而起步的人生，以及和他发生过这样那样联系的其他一些形形色色“兵”的人生。这样的书写是狭义的，又是广义的。说狭义，是因为这里的“藏地”实际上只指青藏线，而连接西藏两地的青藏之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贯通，之于漫长的汉藏关系史，其实是相当短暂的，而且“兵”也并非此路上仅有的旅行；说广义，则是因为王宗仁先生借助个人经历及独有的见识，扫描、放大了这条路上众多无名者的细节和样貌，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和样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堪与长河般的历史“身影”等量齐观的。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样一点，是因为相对于浩瀚的历史时空，相对于宏大历史叙事，其他一切具体的个人经历、鲜活的生命印记几乎都会被淹没，都会被淡忘。而文学恰恰可以于“历史”书写的留白之处点缀涂抹，让我们的记忆除了框架还能看到一些血肉。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经有幸与王宗仁同赴青藏高原，并一同去过位于格尔木市郊的一处烈士陵园。当时见到的情形，正如王宗仁此书中所写的，“没有围墙，也无人管理，那些没有排列规则、大小不一的坟堆把墓地伸展得一年比一年扩大。当初立在各个坟前的木板碑绝大多数已经被岁月的风尘荡平，许多的烈士都成了无名的死者……”翻开《藏地兵书》，几篇章篇都要写到一些普通的死者，大部分篇什亦没有忽略对坟墓的特别交代。士兵之墓，女军人之墓，军人妻子之墓，

我们挖掘”，刻画出废墟上的挖掘者的形象，竭力赞美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我军官兵怎样冒着余震的威胁，“挖出一条让生命延展的通道，在黑暗中挖出一缕微弱的阳光”。读者从这样的诗句可以真切地感到，诗人心系遇险同胞的那份急切与至诚。

对于刘立云而言，历史也是一片诗性的田野，从历史之中寻找诗意的触点，似乎是其经常具有的思考方式。雁门关、圆明园等，这些有着巨大历史承载的地名，立云从这里进入思索并进行别具匠心的叩问，磅礴的诗情也由此铺展开来。“在我清晚的骨骼中/就应该锈蚀秦朝的残戈/汉朝的断戟和宋朝的箭镞/说不准还有一颗从日本人的三八大盖中/凶煞射出来的弹丸”(《我对雁门关说》)，诗人打开的似乎是关于历代兵器的记忆之匣，裸露出的则应是诗人精神世界里战争烟尘所沉积的厚重岩层。而令国人备受感痛切的圆明园，诗人则追求某种不一样的陈述和表达：“那在一天中偿还一百年的残缺/仿佛过去的坎珂、崎岖和内心的挣扎/都是我们在时光中沿路抛撒的鲜花”(《圆明园日记》)，痛切中仿佛透出某种超越的旷达。《养在肺里的弹片》中的老兵经历，对于战争的幸存者来说也许不算稀奇，然而“弹片/那块在他的肺里养了/六十年的生铁”，只能在老兵无疾而终后“从他骨灰里扒出”，这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却是何等的令人震撼和感慨！

我们相信，获奖之后的诗人将再度出发，迈开探索军旅诗歌创作巅峰的永不停歇的步伐。

她的一句话因她没时间听到而永远带走，想哭一场都没有时间。这样的叙事急促而不凌乱，把一个医务工作者在地震中抢救伤员的忙碌和对母亲的深深遗憾作了面貌清楚的梳理。如16岁的金辛亲手埋葬8岁孩子的情景，他在为孩子“洗脸”时，他心里是害怕的，看到孩子脸上突然有泪水更害怕了，后来发现是他自己的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埋葬孩子后又采一把野花放在孩子身边。这些细节描写都是在不经意间不着痕迹地完成置换，具有很强的清晰度和认同感。又如向东帮老大娘挖压死的老伴时，把从死者的一条防盜内裤里挖到的1000元人民币交给老大娘，老大娘骂着死老头还藏私房钱，刚一骂完又抱着老伴的尸体号啕大哭。叙述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语言有不错的透视性。李鸣生的作品中常有可以言说的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的叙述是他沥血锥心的深情行吟，细致且精准表现出属于地震时灾难的个性场景和个性事件，感染力是一望而知的。基于这些特点，文学表达便有了一定的厚重，震中的裂痕从人心向四周幅射开去，在同类题材中赫然而出的深层反思无疑隆出一片魅心魅意的事高地。

地震毕竟是在隆隆声中开始，是在一片废墟中结束，而灵魂的惊悸在破碎中站立显得很不容易。李鸣生的作品中用“我”的个性化视角串联起各个相关内容和章节，有“我”的地方弥漫着更为深切的痛楚。在他梓里发生的天崩地裂，急遽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承受催生了作品另一种更真实的精神呈现秩序，在技巧上肯定裹挟起更多的还原式虔诚，语言上依然斡旋于逻辑与理性的约束，并能服膺于心灵的自动表现。那些无法忽略的伤痛在“我”的滔滔不绝的无语流淌下平静铺陈，去发现那些前所未知而一直游走的细部，拖曳出更为深沉的表现，正如海明威所说，冰山八分之七的体积是隐藏水底的。

《震中在人心》，李鸣生用心灵行吟心声，很好地运用文学涂进了图片的震撼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看是撞击人们情感强劲的后座力，展示了报告文学和谐的传递范式。但作品最成功之处，在于作者用灵魂镌刻的心灵之裂痕宛如冲击波，排山倒海。

一部生命之书

——评散文集《藏地兵书》 □殷 实

《藏地兵书》是王宗仁对自己心中藏地的珍藏，是他融入了太多自己生命印记和体验的藏地之书。之所以要冠以“兵书”二字，大约是因为他的全部眷恋和情思，皆缘于他作为一个“兵”而起步的人生，以及和他发生过这样那样联系的其他一些形形色色“兵”的人生。这样的书写是狭义的，又是广义的。说狭义，是因为这里的“藏地”实际上只指青藏线，而连接西藏两地的青藏之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贯通，之于漫长的汉藏关系史，其实是相当短暂的，而且“兵”也并非此路上仅有的旅行；说广义，则是因为王宗仁先生借助个人经历及独有的见识，扫描、放大了这条路上众多无名者的细节和样貌，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和样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堪与长河般的历史“身影”等量齐观的。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样一点，是因为相对于浩瀚的历史时空，相对于宏大历史叙事，其他一切具体的个人经历、鲜活的生命印记几乎都会被淹没，都会被淡忘。而文学恰恰可以于“历史”书写的留白之处点缀涂抹，让我们的记忆除了框架还能看到一些血肉。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经有幸与王宗仁同赴青藏高原，并一同去过位于格尔木市郊的一处烈士陵园。当时见到的情形，正如王宗仁此书中所写的，“没有围墙，也无人管理，那些没有排列规则、大小不一的坟堆把墓地伸展得一年比一年扩大。当初立在各个坟前的木板碑绝大多数已经被岁月的风尘荡平，许多的烈士都成了无名的死者……”翻开《藏地兵书》，几篇章篇都要写到一些普通的死者，大部分篇什亦没有忽略对坟墓的特别交代。士兵之墓，女军人之墓，军人妻子之墓，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近日在京揭晓,军队作家创作的五部作品获奖,展示了军队文学创作的崭新成果和雄厚实力。我们特邀请几位评论者撰写了一组文章,介绍获奖作品,点评创作特色,以方便读者阅读。

——编者

身在海军的陆颖墨以表现海军精神为自己的文学职责,写了大量有关海军的文学作品。海军生活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源源不断的资源,他可以持续不断地写下去,于是他在《海军往事》中找到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写作状态的结构,这是一种开放性的、向前不断延伸的结构。它像一棵正在生长的葡萄枝,一串串葡萄在枝上冒出;每一颗葡萄都是完整的,而组合成的一串串葡萄更加美丽。因此我在读《海军往事》时,就没有一种结束的感觉。我想,只要陆颖墨的海军情结没有改变,他就会把《海军往事》一直写下去,因为中国的海军一直在向前迈进,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辉煌。《海军往事》从标题的含义看是往回看的,往事是对历史的回望。然而陆颖墨的叙述却是往前看的,他从海军往事中看到了海军的未来,看到了一种充满着活力的海军精神。这也是《海军往事》的基调。

《海军往事》的结构也是一种发散型的结构,它没有固定的人物和事件,因此它也就没有了丝毫的约束,海军生活中所有新鲜的素材都可以被纳入进来,但它又不是盘散沙,在它的结构中隐含着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第一个人物是海军,第二个人物是作者自己。说它第一个人物是海军,就因为陆颖墨非常明确地是要为海军塑像,无论他写的是将军,还是一名普通的导弹兵,他所看重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海军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水兵的生活、水兵的情感、水兵的韵味、水兵的追求”。他力图去发现海军精神是如何在这些人物品上上闪光的,正是这样的闪光点成为他的小说构思的引线。《舱门》的主题无疑是赞扬海军战士钢铁般的纪律意识,但我发现这篇小说的构思却来自一个与海军生活密切相关的微小细节。这个细节就是黄桃罐头。不深入到海军舰艇生活中的人是不会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的,出海水兵因为长期吃罐头食品,会吃得毫无胃口,然而而在众多的罐头中,惟有黄桃罐头比较受欢迎。陆颖墨正是从这一细节生发开去,写出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陆军出身的将军来调研,钻进一艘潜艇里,在艇员自办的简报上读到一首题目叫“永远的黄桃”的诗歌,当他明白了海军战士为什么喜欢黄桃时,就觉得这黄桃可能成为打开潜艇兵远航饮食的一把钥匙。将军非常兴奋,决定改变计划,要进到舱里在潜艇里住一晚,摸到更多第一手资料。故事峰回路转,能不能让将军进舱成为重点,大家劝将军不要进舱,因为如果舱门打开,就意味着这次试验结束。将军一听,更大决心要进去,还换上了作训服。但是舱内的艇长宁可受处分,也坚决不开舱。这时,将军笑得非常灿烂,因为刚才只是他出的一个难题,但他发现,“我们的潜艇兵比我想象的还要勇敢,还要优秀!”从黄桃罐头,到不开舱门,作者的构思曲径通幽,却一刻也离不开海军精神。总之,陆颖墨在《海军往事》中写了各色人等,但他们都是海军,都带有鲜明的水兵特色,都高扬着海军精神。同时,他们又都是海军中的“这一个”。

书中还有一个隐含的人物就是作者本人,也就是说,陆颖墨写《海军往事》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来写的,字里行间,倾注着他对于大海的热爱,对广大海军官兵的敬仰,对海军事业的自豪感。这种情感首先是通过大海传递出来的,有一首歌曲唱道:“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哪怕大海喜怒无常,给海军将士们制造了多少麻烦,哪怕在惊涛骇浪中出海,水兵们晕船晕得胆汁都吐出来了,但他们爱大海仍然爱得义无反顾。在《舷窗》中,陆颖墨以同样的情感写出了海军与大海的难舍之情。“我”要采访一位老舰长,可老舰长已经说不清话了,前言不搭后语。“我”为了唤醒老舰长的记忆,找来很多大海和海军的照片,摆在他的床头,但他说“不像”,后来“我”请教一位老水兵,才知道舰上的海是圆的,因为在舰上都是从舷窗往外看大海的。就这样,“我”一步步走近了老舰长记忆深处的大海。《远航》中,父亲与老西昌舰有一种心心相印的关系:“老西昌舰只要一起航,父亲的腰部就会疼。”我宁愿相信在海军生活中这是确有其事,因为海军将士们长年累月的出征,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依附在战舰的身上。陆颖墨直接抒发情感的方式就是拟人化。海军每天与大海和军舰或是小岛做伴,他们将身边之物都视为有生命之物,与之对话交流,这大概也是海军的特征之一。陆颖墨在《海军往事》中也充分表现了海军的这一特征。

王蒙先生称赞陆颖墨的《海军往事》“把海军战士的生活写得那样平实清纯,内敛着激情,蕴藏着感动,焕发出阳光”。这是非常中肯也非常准确的评价。《海军往事》就像是一扇扇舷窗,我们通过这一扇扇舷窗,看到了大海真正的颜色,看到了海军真正的风采。

一部生命之书

——评散文集《藏地兵书》 □殷 实

军人的孩子之墓……王宗仁起先是一个听故事者，后来，随着他在青藏线上超过了上百次的穿越，包括在沿线兵站的驻留采访，许多支离破碎的情节、有头无尾的事件、语焉不详的传闻，都渐渐被连级补充，得到实证还原，他开始把这些一般人无从知晓来龙去脉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入读或者是听。有的故事，一次没有讲完整，或者也曾被他自己讹传，当他获取新的资料、证言后，又进行续讲、重新讲。从格尔木开始，南到拉萨，西至可可西里，北往敦煌，在这些早期主要是由汽车兵们用车轮子碾出来的物资运输线上，几乎所有者的故事都和死亡有关。他们的事迹，更多显现出的是命运的偶然、情感的执著，或者是心曲的独特等等。一个辞掉教员工作到温泉兵站陪伴丈夫至死的无名“大姐”，一对在江河源医疗站恋爱、结婚并且生子的军人夫妻胡明和叶萍；旧西藏贵族女子拉姆与解放军平叛部队班长李湘的传奇奇恋；更有一位叫宋姗姗的兵站女站长，其父34年前作为汽车兵倒在了青藏线上，当年幼的儿子被辗转捎来兵站时，在途中不幸染病离世，她把未成年的儿子葬在兵站附近，将昆仑山口附近的一处山坡认作是自家的祖坟地……读此书，读者不得不惊讶：差不多每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如今都在青藏线上清冷岑寂的墓穴中化作永恒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往返中，除了继续倾听，除了校正自己的记忆，王宗仁也要尽量祭拜那些无人照看的坟茔，然后用笔墨平复内心的波澜，缓释自己对逝者的刻骨思念。事实上，这种作者与其描述对象之间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是十分罕见的，王宗仁在意识中显然并未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近日在京揭晓,军队作家创作的五部作品获奖,展示了军队文学创作的崭新成果和雄厚实力。我们特邀请几位评论者撰写了一组文章,介绍获奖作品,点评创作特色,以方便读者阅读。

——编者

一扇扇舷窗

——评短篇小說集《海军往事》

□贺绍俊

离开过青藏线多远，他总是把自己作为那里的一分子而不是一般的外来客、旁观者。他会在一年中的第一场落雪开始时，为藏北黑河兵站附近的一座无名女兵墓中亡灵“衣被”的薄厚揪心，因为他目睹了这个女兵的牺牲过程——从叛匪手中夺枪，又和几位战友亲自将这位女兵在路边掩埋，却始终打听不出这位女兵身边的籍贯、姓名，此事常常让他想得心痛。他的同乡战友于得江，在运输物资途中遭伏击而死，未能完成任务，没有受到任何赞扬，被匆匆葬于帕颜克拉山冰冷的怀抱，他为此47年无法忘怀……凡此种种，都不是一般记者、作家的浮泛“采种”可以胜任的。王宗仁在自己的写作中融入了太多的个人感情、个人经历，可以说，他已经不是在铭记别人的事迹了，而是在整理自己精神的蕴藏，在一点一滴完成自己的生命之书。但反过来看，这种真诚的、对记忆的不断修复，正是因为映照出了他人生命的弥足珍贵，才显示出书写的价值和必要。

《藏地兵书》的写作难度在于，文中所涉及的，都是小人物和小事件，并非每个人、每件事都可以上升到军队、国家意义的层面去褒奖。因此，王宗仁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可能是任意的、随意的，但在讲述故事的方法上却深思熟虑：或从结尾讲起，或半路折翻重写，或订正补充从前所讲过的。譬如像《情断无人区》这样的篇什，就是通过一句“鸟兽同穴”的箴语，验证自己旧作的真伪，以及一只忽隐忽现的藏靴的踪迹，推进着自己的讲述，最后却仍旧把谜一般的结局留给了读者。细看整部“兵书”，其中没有哪一篇是虚构的，但在客观上，大部分篇章常常都有“小说”般生动可读的精彩。此外，作家也未见将自己的主题刻意向“历史”或“时代”方面倾斜，却出人意料地为历史进程的言说添加了新的样式、新的内容和新的证词，而我认为这恰恰是最值得赞赏的。